

近代西方教会在粤东客家地区的传播及其影响述略

○ 韩 小 林

(嘉应学院 政法系, 广东 梅州 514015)

[摘 要] 以梅州为中心的粤东客家地区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人文环境, 成为近代西方宗教势力发展的重要地区。西方宗教传入粤东客家地区, 进一步激化了当地的社会矛盾, 同时, 他们也创办了一系列近代化的学校, 传播了近代西方文化, 特别是一些先进科学技术, 培养了一批近代化人才, 为粤东客家地区乃至整个广东的社会经济的发展和进步做出了贡献。西方传教士又把粤东地区的客家文化传入西方各国, 在加强中西文化交流和了解方面起到了桥梁和纽带的作用。

[关键词] 西方教会; 天主教; 基督教; 粤东客家地区

[中图分类号] B97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642X(2003)01-0110-04

粤东客家地区毗邻赣、闽两省, 前接珠江流域地区和潮汕平原, 是广东相对封闭的、商品经济较为落后的地区。随着西方殖民主义者在东方的不断扩张, 特别是 1842 年鸦片战争之后, 中国独立自主地位的逐渐丧失, 国门洞开, 闭关锁国的中国也被迫纳入整个世界资本主义的势力范围, 使近代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都深深打上了半殖民地的烙印。伴随着西方殖民主义势力在中国的进一步扩张, 西方教会势力也得到不断拓展, 粤东客家地区也不例外。而且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特殊的人文环境, 使粤东客家地区成为西方教会势力发展的重要地区。本文拟对近代西方教会在粤东客家地区的传播和影响作粗略的探讨。

西方天主教大概于明末传入闽西地区, 清代嘉庆末年, 天主教传入丰顺县境。当时丰顺埔寨茅园村妇杨氏因儿生病, 到揭阳大洋(今揭西县境内)天主教石神甫处求医, 因而信教。后杨氏通过亲戚将天主教传至大罗、邓屋寮、石门池、柑园等处。^{[1](P995)} 清朝道光年间, 天主教传入粤东客家的中心地区——嘉应州; 光绪年间再传入闽西。1844 年归侨天主教徒吴东在梅县城东书院开始传教, 1850 年由汕头教区派法国籍李神父到梅县建立第一个祈祷所, 这是近代西方天主教传入粤东客家地区的开始。咸丰年间, 蕉岭天主教徒曾桂英到福建省武平县坝下乡设立“涌经所”, 天主教再次传入闽西地区。随后, 法国巴黎外方传教会在汕头设立“嘉应州天主教教会”, 1925 年升格设立为“嘉应教区”, 管辖梅县、兴宁、五华、蕉岭、平远、大埔、龙川、

和平、连平等 9 个县的教会, 由美国玛利诺外方传教会经管, 指派美籍福尔德神父和陈神父主持嘉应教区的工作。这段时期, 全教区有教徒 4 000 人, 教堂 10 间, 小堂 37 间, 小学 11 所。1929 年嘉应教区升为“监牧区”, 1935 年升为“代牧区”, 福尔德神父任代牧区主教。自从嘉应教区成立以后, 天主教在粤东客家地区迅速传播和发展, 最多时教徒人数多达 1.6 万多人。在 1933—1945 年间, 嘉应教区有天主教堂 23 座、祈祷所 12 间, 并建立了女修院、小学、儿童道理班、露德圣母青年会等。直至 40 年代末, 嘉应教区有神父、修女 51 人, 其中美籍 27 人, 法籍 2 人, 中国籍 22 人, 教堂 29 间, 祈祷公所 20 多处, 圣约瑟修道院 1 间, 女修道院 6 间; 教会中学 1 所, 小学 6 所, 识字班 4 个, 施药处 7 个, 织布厂 1 间, 单车店 1 间。^{[2](P323-324)}

基督教于清朝咸丰年间传入粤东地区。清朝咸丰二年(公元 1852 年)基督教开始传入粤东客家地区。传入粤东客家地区的基督教主要包括崇真会、浸信会、长老会、安息会、聚会处、真耶稣会等 6 个教派。至 1949 年, 梅州地区共有基督教教堂 60 间, 教徒 11 492 人, 隶属于瑞士巴色传教会。

基督教崇真会教徒张复兴, 在香港洗礼入教后, 咸丰二年(公元 1852 年)回到其家乡五华县大田樟树村传教, 这是近代西方基督教首次传入粤东客家地区。1877 年, 五华县基督教教徒梁启明来到梅县传教。1887 年, 瑞士牧师屈能伸到梅县主持教会, 然后再发展到兴宁、蕉岭等地。到 1949 年, 五华县有崇真会教堂 23 座, 宣道所

[收稿日期] 2002-12-01

[作者简介] 韩小林(1964-), 男, 四川岳池人, 嘉应学院政法系, 副教授。

3间,教徒5475人,占梅州崇真会教派教徒总数的70%。梅县有崇真会区堂1处,支堂2处和南口、白官、西阳、莲塘等直道所。在兴宁的坪塘、沙坪、罗岗、罗浮、岗背、黄陂、大坪、兴城、水口、陂坑、龙田、石马、新陂、叶塘等地先后建立教堂14座,教徒1000多人;1898年,蕉岭县城建教堂1座。^{[2](P285)}

基督教浸信会是1890年美国传教士甘武夫妇最早到梅州传教,在梅城东门建立基督教堂1座,设立大坪、长沙福音堂,南口、白渡、水车直道所,教徒700余人。1910年,教徒陈宏光、蔡瑞廷到丰顺县汤坑镇传教,1915年,甘武牧师到平远石正传教,后建立石正福音堂。

基督教长老会由设在汕头的岭东大会于1884年派出传道员到大埔传教。先后在高陂、湖寮、洲瑞、百侯、西河、三河等地建立教堂,教徒达1087人,1890年,再传入丰顺汤坑。1905年,建留隍教堂1座,先后建汤坑、丰良、埔寨、河子、汤南、新楼等教堂,教徒有319人。梅县有松口福音堂,隆文、松源设置直道所,教徒有91人。

基督教安息会最早是曾庆全于1918年到丰顺汤坑镇布道,设立聚会点,1945年,美籍传教士恩孙开始在兴宁传教,并先后在兴宁、梅县建立礼拜堂。此外,基督教聚会处和基督教真耶稣会等都先后在梅州传教,并建有教堂。^{[2](P288)}

综观近代西方宗教在粤东客家地区的传播和发展,具有显著的特点:

1. 宗教的门派较多,特别是基督教多达6个教派,遍布梅州七县一区以及龙川、潮汕、寻鄒等周边客家地区。基督教崇真会主要分布在五华、梅县、兴宁、蕉岭等四个县;基督教浸信会主要分布在梅县、丰顺、平远等县;基督教长老会主要分布在大埔、丰顺、梅县等县;基督教安息会主要集中在兴宁、丰顺、梅县等县。

2. 西方宗教传入粤东客家地区主要有两条途径:一是先以汕头作为基地然后逐渐向粤东客家地区传播。由于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汕头、潮州相继开放,西方势力包括宗教势力很快进入这一地区,并把汕头建成侵略基地,迅速向周边地区扩展势力。粤东客家地区的西方宗教的传播主要是由汕头传入的;二是由外出客家人入教后回到家乡传教的。由于粤东客家地区地处山区,人多地少,生活条件恶劣,因而有大量的人员外出南洋及沿海地区谋生,而这些地区西方宗教传播早,势力强大,可以说无孔不入,外出谋生的客家人信教后回家乡开始传教的。如蕉岭兴福乡龙安村人谢云岩,外出广西谋生时信奉天主教,1866年回到家乡后,自愿让出房屋作为天主教活动的场所,邀请当时在梅县传教的法籍彭神甫前来协助传教,谢云岩的家就成为天主教在镇平县的传教点,到1872年,发展成为能容1000多人的大圣堂。

3. 粤东客家地区崇尚读书,保持了中原文化教育的传统,特别是梅州地区,素有“文化之乡”之美誉,因此,到粤东客家地区传教的外国传教士,一般都具有良好的中华文化的修养,尽管他们是洋人,但都取有地道的中国汉文名字,借助汉文化来传播西方宗教。或者首先吸收当地颇有影响的读书人人教,然后利用他们的影响进

行传教。这是近代西方宗教在粤东客家地区传播的一个显著特点。如20世纪初在兴宁坪塘设立的基督教堂和神科学院,其教徒及教员的文化素养都很高。神科学院的教师,当然都是基督教教徒,具有很高的文化素养。当时在神科学院先后任教的中国教师有:罗斧月,晚清秀才,主讲《四书五经》;刘思源,广东和平县人,毕业于北平燕京大学,主讲语文;朱焕播,广东五华县人,北京协和神科学院毕业,主讲神学;张承恩,广东省兴宁县人,毕业于广州神科学院,主讲地理历史等等。如基督教巴色传教会于道光二十六年(公元1846年)决定派遣黎力基(德国人)、韩山明(瑞士人)来粤东客家地区传教。当时两牧师结伴来到中国,先在香港向德籍传教士郭实腊学习汉语,同时,他们努力学习客家话,并收集大量资料,准备编辑客家话与德文对照字典。经过14年的准备,他们第一次用罗马字拼音客家话注释的《马大福音》印刷出版,为传教士在客家地区的传教准备了条件。以后还创办《罗马字拼音客家话报》,出版了《客家德华字典》、《罗马字客家话新约圣经》等,这样大大方便了西方传教士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客家文化,方便了他们在客家地区的传教。所以,进入梅州客家地区传教的传教士,不仅懂中国文化教育和文化传统,讲一口流利的汉语,而且还了解客家地区的风俗习惯,还能讲客家方言。1858年,法国外方传教会派神甫卫加禄来兴宁赤沙岭建立教堂,这是兴宁最早的一所教堂。传教士卫加禄神甫为了便于顺利开展工作,他还迎合当地的风俗习惯,专门留了辫发,穿着长衫。这样使传教活动得以迅速发展,他传教20多年,共发展教徒300余人。而且尽量任用中国籍神甫来传教,以便减少各种阻力,当时兴宁赤沙岭教堂,就先后委任中国人袁秉彝、林以忠、张德臣、罗有光、陈丙姐等人来协助传教。还对贫困教徒给予金钱、衣服、药品等资助,而且还资助一些教徒就读中学或大学,使信教人数迅速增加。

4. 近代粤东客家地区的西方宗教,前期以法国势力为主,后期以美国的势力为最大。以梅县天主教为例,1900年以前来梅县的传教士全部是法国籍的;20世纪来梅县的外国传教士都是美国籍人。如据1950年调查统计,梅州地区天主教有外籍神职人员29人,其中美籍神职人员就有27人。^{[3](P177)}基督教主要以美国为主,如在粤东客家地区传教时间长、影响较大的都是美国籍人,如目为霖、甘武、汲平等。^{[4](P14)}这充分说明到20世纪,美国在华的侵略势力逐渐增强,成为在华侵略势力最大的国家之一。在华的宗教势力的发展是与其在华的政治、经济侵略势力的扩张是完全一致的。

2 粤东客家地区人多地少,自然条件恶劣,阶级矛盾、阶级斗争十分尖锐。随着西方宗教势力的侵入和扩张,西方传教士为了建教堂而大肆掠夺、占领当地农民的土地房屋,使粤东客家地区的社会矛盾更加激化。由于客家地区山地多,土地少,历来都是“寸土寸金”,再加上广大群众对西方宗教的抵制,传教士很难买到用以建教堂的土地,因此,传教士便勾结不良教徒或当地奸民,采取强买强卖、盗买盗卖、骗买等方式和

手段取得土地。1906年,丰顺砂田圩天主教士强占当地商店以设教堂,民众坚决抵制,群起驱逐传教士,毁坏教堂。^{[1](P19)}这样使当地民、教矛盾进一步激化。此外,在粤东客家地区,外国传教士自恃有不平等条约的保护,横行霸道,欺压群众,恃强凌弱,更加激化了当地本来都相当尖锐的民、教矛盾,导致大规模的民、教冲突。如在兴宁县,德、奥、日、法等国的教会先后在兴宁城西观音堂、城北坪塘、城东赤沙岭、大岭上以及泥陂、罗岗、罗浮等地设立教堂。传教士神气十足,袒护不法教徒,甚至纠结豪绅,收租放债,包揽诉讼,欺压平民。由于传教士的暴行激起了当地人民的强烈反抗,当地的秘密反清组织“三点会”在其首领潘亚星的率领下,掀起焚烧外国教堂的大规模的反教斗争,沉重打击了西方教会势力的嚣张气焰。清政府迫于西方列强的压力,派兵在大肆镇压和屠杀当地群众,使客家地区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异常激化。在20世纪20年代,爆发了多次反对教会的斗争。如1924年5月6日,广益中学爆发了“反对读圣经,反对帝国主义奴化教育”的爱国学潮,280多名师生离开广益中学,在当地热心人士的支持下,另行创办了一所新型的中学——学艺中学,后来周恩来称赞它为“东江第一中学”。1925年5月,广益中学、乐育中学再次爆发“要求收回教育权”的反帝学潮,刘裕光、蓝胜青等组织了“反对基督教学生大同盟”,刘清如、王之伦等组织“革新社”,遭到地方政府当局的残酷镇压,有200多学生被开除。7月至8月间,“反对基督教学生大同盟”、“革新社”及“学生救国运动团”三个学生组织在梅城“人境庐”秘密成立“梅县革命青年团”。1926年春,梅城附城各界2000多人在东较场集会,强烈要求收回教育权,会后,1000多人包围了嘉应大学,最后迫使地方当局让步,斗争取得最后胜利,梅州地区各教会学校陆续由本地人担任校长。这样梅州地区的人民与西方教会势力的斗争取得了较彻底的胜利。^{[2](P34-35)}

当然,西方宗教在粤东客家地区传播的同时,创办了一系列近代化的学校,如光绪三十年(公元1904年)与嘉应州地方人士联合创办务本中西学堂(1911年改为乐育中学)及乐育小学。民国四年在东门创办教会广益中学,民国11年在梅县城东创办广益女子中学。民国12年还与嘉应州地方知名人士黄墨村、廖道传等一起创办了嘉应大学。^{[3](P1767-1780)}在兴宁,1882—1920年间,基督教创办了乐育小学7所;1925—1949年在兴宁坪塘开办神科学院等;这些教会学校可以说是粤东客家地区近代教育之先河,为当地士绅创办近代新式学堂提供了一个参考的标准,树立了榜样。如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创办的乐育中西学堂,课程设计以西学为主,从《甲辰岁西学功课表》来看,一年级学生要修读英语、算学、地理、外史、修身、博物、中国历史、物理、体操等九科,二年级则增修德文课。由于学堂以教授西学为主,而且西学由凌志高和嘉乐天牧师亲自任教,故学堂开办后,州城官绅名流趋之若鹜,纷纷送其子弟入读。^{[4](P4-7)}同时,这些学校主要以招收当地学生为主,不断扩大招生规模,培养了一大批人才,后来成为著名的小说家、医学家以及革命者等,如张资平、梁伯强、梁浣春、叶剑英等。美

国籍福尔德主教在未来嘉应州之前,就资助龙川郭保良游学美国,获芝加哥大学博士学位。郭博士学成回国后,先后服务于国立中山大学、安徽大学、国立武汉大学,并担任武汉大学化学系主任。福主教到嘉应州后,又资助了许多当地青年学子游学国内各大学。毕业于北平辅仁大学的有:李一鸥,梅县黄塘圣若瑟修院国文教员;李启修,上海徐汇公学启明女中国文及公民教员;刘不凡,北平辅仁大学附属中学教务课课长;叶德禄,北平辅仁大学附属中学教员。毕业于上海徐汇师范的有:张汉威,供职于蕉岭天主教堂;钟海涛,任梅县黄塘传道讲习所教员。肄业于北平辅仁大学的有:杨日麟、曾宪定、张安得、郭恒渭等;肄业于天津工商学院的有:吉广成、李崇高。而且当时有的公立学校,还聘用外国传教士担任教员。如梁浣春担任校长的公立嘉善女校,专门聘请了两名德国女传教士担任音乐、体操和编织教员。在五华,同治十二年(公元1873年),德国、瑞士巴色传道会在五华长布区源坑乡开办了中书馆,开设了一些现代体育课,如设置了单双杠及体操、球类等项目,并有了篮球、足球场等运动设施。从此,五华县内现代体育运动蓬勃开展起来,而且成为梅州地区足球运动的发源地。这些教会学校和西方传教士传播了西方文化,培养了一批近代化人才,为粤东客家地区乃至整个广东的社会经济的发展 and 全面进步做出了贡献。而且,传教士也把近代西方的一些先进科学技术传入这些地区。梅州地区的西医药都是由各国传教士在传教之时于19世纪传入粤东客家地区的。清朝咸丰二年(公元1852年)基督教瑞士巴色传教会派遣德籍韦求福牧师来到五华县大田樟树村建筑教堂。传教士为了给当地村民治病时使用了西医药,清光绪九年(公元1883年)12月,总部又派遣德籍韦嵩山博士来梅县基督教堂开设西医诊所,由于当时场地的限制,病房都设置在教堂内和附近民房内。光绪二十二年(公元1896年),瑞士巴色传教会在梅州附城黄塘创立德济医院,医院使用西医药,注意培养中国籍医生、护士、助产士,使他们得到较全面的近现代西医科学的教育,系统地吧欧洲现代医药科学传入粤东各县,辐射到周边省区,德济医院为粤东客家地区医药事业的发展,特别是近代西医药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德济医院(今天的梅州黄塘医院的前身)在闽粤赣三省边区享有很高的声誉。^{[5](P1430-1431)}如五华的古旭焯,从小跟随父亲信仰基督教,早年就读于乐育小学、梅县乐育中学,中学毕业后进入黄塘德济医院,跟随瑞士籍、德籍医生学医,他在外籍医生的精心培育下,刻苦学习了现代医学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并经过严格的临床实践训练,最后成为梅州地区人民爱戴的名医。^{[6](P40)}此外,天主教在梅州地区除传教之外,也为梅州做了一些社会公益事业。如梅县建造梅江桥时,是法籍神甫南善传设计大桥的方案、绘图等,而且教会还捐助了一个桥墩的资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香港沦陷,大批难民逃到梅州,当时梅州又正遇上灾荒,天主教会为了安置难民失所的难民,每天大量施粥,每天有600多人到天主教堂排队食粥,同时,天主教会还为一些逃难的妇女

童解决住宿问题,组织难民学习一些手工工艺技术,如织竹篮、做纸扇、鸡毛扫等,掌握一定的生活技能,帮助他们解决一些生活困难。^{[3](P177)}

3 由于以嘉应州为中心粤东客家地区,自然条件恶劣,人们生活艰苦,因而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人民,带着各自不同的动机和目的参加教会。有的是借入教祈望改善自己坎坷的命运;有的人教是希望获得教会的一些慈善物质的救济;有的是为了寻求西方宗教势力的保护而达到自己政治、经济目的等。总之,西方宗教传入粤东客家地区,进一步激化了本来都非常尖锐的各种社会矛盾,使该地区的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更加复杂化,同时也为西方列强在粤东地区的进一步渗透创造了条件。但是客观的讲,西方宗教传入封闭的粤东客家山区,加强了这些地区与外界的联系,使这些地区也能感受到整个世界发展的脉搏,开阔了人们的视野,特别是一些近代科学技术传入粤东山区,起到了一种启蒙的作用。以后粤东客家地区,特别是嘉应州成为近代得风气之先的地区,各种杰出人才辈出,这与西方宗教的传播和发展有密切的联系。同时,西方传教士又把粤东的客家文化传入西方各国,使西方各国加深了对客家文化的了解,从而在近代,西方各国出现了

研究客家文化的热潮,出现了大量介绍和研究客家文化的著作,主要有:英国学者爱德蒙著的《客家人种志略》、《客家历史纲要》、《中日访问纪录》等(1867年出版);皮顿著的《客家源流与历史》(载1873年《中国评论报》);在嘉应州传教20多年的法国天主教神父赖尔查斯著的《客法辞典》(1901年出版);英国麦基威尔编《客家词典》(1905年出版);在客家地区居住多年的美国传教士罗伯史密斯著的《中国的客家》(载1905年《美国人》杂志);在梅县传教数十年的英国传教士肯贝尔著的《客家源流与迁移》(1912年口头报告,后印成小册子);主持《美国地理学会杂志》刊务多年的美国现代文化地理学权威韩廷教授著的《种族的品性》,专门论述中华民族的第四章(其中有相当内容论述客家特性);在嘉应州传教多年的美国天主教神父拜尔德耳著的《客话易通》、《客话浅说》、《客语浅句》等。^{[4](P7)}由此可见,外国传教士在介绍客家文化,推动客家文化研究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可以这样说:“西人对客家的认识和探究是始于西教士的传教运动”。^{[7](P244)}因而西方宗教在传播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特别是客家文化,加强中西方文化交流和了解方面起到了桥梁和纽带的作用,是毋庸置疑的。

[参考文献]

[1] 丰顺县志[M]. 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5.

[2] 胡希张等. 客家风华[M]. 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7.

[3] 梅州市志,上中下[M]. 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

[4] 华南客属联谊会年刊[J]. 客属联谊会出版,1932.

[5] 乐育中西学堂编. 嘉应乐育中西学堂[Z]. 光绪29年嘉应

石印本.

[6] 黄伟经. 客家名人录[J]. 广州:花城出版社,1992.

[7] 谢剑,郑亦茨. 国际客家学研讨会论文集[C]. 香港中文大学、香港亚太研究所海外华人研究院,1994.

责任编辑:陈火祥

The Spread and Influence of Western Religious Associations on the Hakka Region of Eastern Guangdong in Modern Times

HAN Xiao-lin

(Jiaying University, Meizhou 514015, China)

Abstract: The Hakka Region of eastern Guangdong with Meizhou as its center, featured by its distinctive geographical location and anthropological environment, became the major target of expansion by the western religious powers. On one hand, the spread of western religions aggravated the social conflicts. While on the other h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a series of modernized schools helped to bring about western culture, especially the advance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western countries in modern times, and to educate many modernized talents, thus making contribution to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this region and the Guangdong area at large. Moreover, the western missionaries introduced the Hakka culture to the West and enhanced their understanding of the Hakkas. Therefore, we should acknowledge that western religions have contributed to the introduc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the Hakka culture in particular, and played a linking role in promoting the Sino-western cultural exchange and mutual understanding.

Key words: western religious associations; Catholicism; Christianity; The Hakka Region of eastern Guangdong

作者: [韩小林](#)
作者单位: [嘉应学院, 政法系, 广东, 梅州, 514015](#)
刊名: [嘉应大学学报](#)
英文刊名: [JOURNAL OF JIAYING UNIVERSITY](#)
年, 卷(期): 2003, 21(1)
被引用次数: 1次

参考文献(7条)

1. [丰顺县志](#) 1995
2. [胡希张 客家风华](#) 1997
3. [梅州市志: 上中下](#) 1999
4. [华南客属浸礼会年刊](#) 1932
5. [乐育中西学堂 嘉应乐育中西学堂](#) 光绪29
6. [黄伟经 客家名人录](#) 1992
7. [谢剑. 郑赤琰 查看详情](#) 1994

相似文献(10条)

1. 期刊论文 [王欣瑞. WANG Xin-rui 陕甘宁边区政府对西方教会的政策分析 - 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1, 31(2)

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后, 为巩固、扩大民族统一战线, 实行了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在特殊历史环境下, 边区政府处理好与西方教会间的关系显得尤为重要。边区政府对西方教会采取了一系列具体的政策和措施, 并取得了良好的成果。边区境内的基督教、天主教教会也发生了很大变化, 为以后逐步走上“三自”爱国道路奠定了基础。20世纪三、四十年代陕甘宁边区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发挥了重要历史作用, 并成为解放后我国宗教政策的蓝本。

2. 学位论文 [王燕荣 西哥特第三次托莱多宗教会议述评](#) 2009

自4世纪初乌斐拉在多瑙河北岸传播阿里乌教派以来, 基督教阿里乌教派信仰在哥特人中普遍传播开来。但随着西哥特历史的发展及其罗马化程度不断加深, 尤其在定都西班牙托莱多之后, 自身的阿里乌教派信仰与当地的西班牙—罗马遗民所信守的天主教信仰发生冲突, 围绕着宗教冲突而形成的两大对立政治集团, 严重威胁着西哥特王国的稳定。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 第三次托莱多宗教会议孕育而生了。本文围绕第三次托莱多宗教会议展开论述, 这次会议之后西哥特正式放弃了阿里乌教派, 确立天主教信仰, 进而开启了西哥特历史的新局面: 将伊比利亚半岛统一在了天主教旗帜下, 顺应了当时西欧的历史潮流, 而且西哥特在这次宗教会议中所申明的“和子句”信条也迅速传至整个西欧, 为之后东西方教会大分裂埋下了种子。

具体而言, 本文的论述分三部分:

引言为第一部分, 简要介绍国内外对此问题的研究现状以及本文要解决的基本问题; 对这次会议的决议内容进行分析; 主要是围绕宗教教义和教会权力扩大两方面来分析这次会议的深远影响。

正文为第二部分, 共四小节。第一小节简要介绍早期哥特人接受基督教阿里乌教派及西哥特人不断罗马化的过程; 第二小节论述第三次托莱多宗教会议召开前后展开的政治斗争, 进而分析会议召开的必然性; 第三小节对这次会议通过的决议内容进行概括分析; 第四小节主要论述第三次托莱多宗教会议的历史地位及意义。第三、第四部分是全文的重点。

结论为第三部分, 总结全文, 简要概括第三次托莱多宗教会议之后西哥特的政治走向、对犹太教徒的迫害, 以及如何间接导致东西方教会大分裂等方面。

3. 期刊论文 [王中茂 近代西方教会在华购置地产的法律依据及特点 - 史林2004, ""\(3\)](#)

西方教会系基督教所属的天主教、东正教、新教三大教派。西方教会在近代中国通商口岸购置地产的法律依据是《南京条约》、《黄埔条约》和《天津条约》等, 在内地置产的依据是中法1860年《北京条约》(中文本)、1865年柏林德密协议与1895年教会内地置产协议。其中《北京条约》中的教会置产内容乃是当时担任翻译的法国传教士擅自增添的, 因而不具有法律效力。清政府就教会置产问题与法国进行过多次交涉, 各教会在华置产的规模和数量相差悬殊, 方式及用途迥异, 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影响也各不相同。

4. 期刊论文 [王中茂 近代西方教会在华购置地产的法律依据及特点 - 世界宗教研究2004, ""\(1\)](#)

在近代中国活动的西方教会, 主要是基督教所属的三大教派, 即天主教、东正教、新教之修会或差会(简称新教)。它们在华购置地产的法律依据是一系列的不平等条约及协议。各教派购置地产的规模和数量相差悬殊, 方式、用途迥然各异, 因而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影响各不相同。

5. 学位论文 [张磊 光宣朝京师医疗机构研究](#) 2007

清代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 它是中国由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逐步走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重要历史时期。尤其是在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 西方国家开始侵入中国, 对中国展开了经济、政治、文化各个方面的入侵。中国的社会矛盾日益突出, 人民生活日加困苦, 农民起义此起彼伏, 整个社会陷入内忧外患的严重境地。中国传统的中医学也受到很大的冲击。在1840年鸦片战争以前, 中国的传统医疗是以中医为主。在鸦片战争之后, 西医凭借优势开始在中国植根与传播, 并逐渐对中医的地位和规范提出挑战。中国的医疗体系也随之发生改变。

清末作为清朝政治中心的北京, 人口约有百万人, 面对如此庞大的人口, 如何解决这么多人的医疗需求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本文通过对光宣朝京师医疗机构的研究, 来分析清末北京的医疗机构的构成及其在清末医疗卫生体系的地位, 借以考察中国是如何从传统医疗卫生体系向近现代医疗卫生体系转变。

清末北京城内主要有官办医疗机构、民间医疗机构、慈善医疗机构、教会医疗机构四种医疗机构的存在。清末受西方影响, 政府兴办了官医局、官医院等多种形式的官办医疗机构, 主要面向广大贫苦百姓, 这在中国历史上尚属首次。在封建社会中, 历代皇帝只注重为皇室服务的太医院, 而对平民百姓却并无专门的国家性质的医疗机构, 往往只是设立一些针对鳏寡孤独之人群的慈善机构, 或成立一些临时性质的医疗机构, 轻视关系国计民生的公共卫生医疗机构建设。到了清末, 由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民主运动的开展, 清政府才开始兴办各种近代企业和公共卫生事业, 产生了内外城官医院这些专为百姓看病的医院, 内外城官医院从创立伊始即有了中西医并重的主导思想, 这开创了我国近现代医院内部中西医发展并重的先河。

中国传统的医疗机构，尤其是官方医疗机构自古以来（以太医院为代表）服务对象主要是面向宫廷及一些主要的政府官员等。而对于广大劳动人民来说，他们患病时只能求助于民间医疗机构。民间医疗机构从服务对象来说，主要面向广大人民群众，间或也为政府官员服务。虽然在清末建立了几所官医院，但对于实际医疗需求来说，只能是杯水车薪，远远不能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实际医疗需求。中国从古至今由于种种原因，一直未建立一套完整的公共医疗卫生体系。民间各种形式的中医诊所、药店等便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承担着广大劳动人民医疗的重任。尤其在清朝灭亡后，太医院解散，代表着国家医疗最高水平的医生进入民间，增强了民间医疗实力，促进了民间医疗水平的提高。鸦片战争过后，清政府被迫与西方列强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丧失了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独立地位，而通过这些不平等条约，西方教会取得了在华传教权、租买土地、建造教堂、办学兴医等多种自由权。于是，大批基督教、天主教的传教士纷纷来到中国，在中国很多地方都建立了各种形式的教会医疗机构。从1861年到1908年，传教士在北京建立了十余所教会医院，通过施行一些慈善医疗措施，使得西医在民间也逐渐得到了认可，也改变了中国人的传统医疗观念。清政府的医疗观念也发生转变，其标志便是在清末建立的官医院中设立了西医部。

清末初涌现了大量的善会、善堂等慈善组织，这些组织通过从民间筹集资金，成立专门机构来救济广大的贫民百姓以及鳏寡孤独等特殊人群。这些慈善机构除了解决救济人群的日常生活动之外，对他们的日常医疗需求也是非常重视的。中国传统的慈善医疗机构中，往往都包含有医疗救助活动在内，在清代就有普济堂、育婴堂等善堂、善会为患病者提供医疗救助。在首善之地的北京，就有以普济堂、育婴堂等为代表的慈善机构从事医疗救助活动。其中尤以普济堂在规模、管理、资金来源等方面最为成熟，且收效显著。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普济堂在收治病人时，已经有明确的分科诊治思想，对于传染性疾病患者，更是将其与其他病人分开诊治，避免出现交叉感染的情况。

本文在讨论部分主要从清末京师医疗机构发展脉络、清末京师医疗机构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光宣朝京师医疗机构对民国初期卫生事业发展的影响。清末北京医疗机构的发展是从中医独立发展向中西医发展并举的方向进行，这种现象一直持续到民国，但我们也应看到在西风东渐的影响下，西医的发展规模、影响也是在不断扩大的，这也造成了中医发展一直滞后于西医的发展。

总的来说，清末京师的医疗机构发展已经初具规模，官方医疗机构、民间医疗机构、慈善医疗机构、教会医疗机构构成了清末京师的公共卫生医疗体系。这一体系尽管因为当时政府腐败，在实际运作中存在着许多不足，但却是中国医疗卫生体系从传统向现代转变的一个重要标志。清末建立的医疗机构在清朝灭亡进入民国后，大多都继续存在，并有了不同程度的发展，这也是我国近现代历史上一大重要成就。清末京师医疗机构的发展奠定了我国近现代公共卫生医疗体系的基础，研究这一时期医疗机构的发展变迁能够更好地理解社会的发展变迁对卫生事业的影响，这或许可以为我们今天公共卫生事业的发展和管理提供一些借鉴。

6. 期刊论文 詹放 《魔戒》中二元论恶观初探 -教师2008, "" (18)

在西方宗教哲学中，“恶的问题”始终是困扰历代思想家的一个逻辑悖论。为了调和经验现实中恶的存在与全善全能的神灵观念之间的天然冲突，历史上各种宗教与哲学流派都试图时恶的本质和起源给出不同定义，其中尤其以天主教奥古斯丁自由意志论与摩尼教二元论两种学说体系的斗争最为引人注目。当代英国奇幻作家托尔金在其代表作《魔戒》中，以令人信服的叙述手法再现了长期被西方教会正统斥为异端的二元论恶观与20世纪工业化战争和屠杀经历之间的恐怖共鸣，以及传统神义论在阐释这一当代邪恶体验中的无力与困境。

7. 期刊论文 王德蓉 辅仁大学与《华裔学志》 -寻根2004, "" (1)

17世纪以来，为了谋求基督教(天主教、基督教新教)在中国的发展，西方教会通过来华兴办教会学校(包括幼稚园、小学、中学、大学)以传播西方知识，且产生了较大影响。作为教会高等教育支柱的教会大学，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中期的中国高等教育体系中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

8. 学位论文 赵广军 西教知识的传播与晚清士流 2007

基督宗教是以圣经维系起来的信仰体系。它在中国传播的主要是新教和天主教两大宗派，统称为西教。晚清，以基督教历史和教义为主要内容的西教知识在中国知识界的传播，主要是通过几个思潮和潮流进行的。在这些思潮中，中国知识界对它的传播具有稳定性和连续性。

本文选取了西教知识传播主体(传教士和中国各类文人)的文化活动、传播载体(各种载有西教内容的文本)的流传、传播途径三个方面，考察了它在几个思潮和潮流中传播所表现出的区别和共同点。主要是选取了几个对应项进行研究：传教士的文化活动与中国知识界的应对；西教宣教文本与中国知识界著述中关于西教内容的比较；传教士对宗教书籍的传播与中国知识界书籍传播方式的比较。从这些比较研究中，整理出西教知识在中国士流中传播的封闭性、稳定性和连续性特点。

第一章首先考察了清政府对基督教弛禁前后西教文本传播情况。主要选择了道光十二年、十五年传教士在沿海冒险散书传教的三次活动作为问题分析切入点。在教禁时期，来华传教士集中于广州、澳门和南洋地区，主要从事印刷、编译等文化活动。宣教区域由于教禁而不能得到扩大。但是在道光朝，他们所面对的是教禁松动、洋防疲弱、鸦片走私猖獗、中外交涉频繁等有利政治环境。故此，传教士冒险沿海上中国，考察扩大宣教区域的可能性。三次沿海航行不仅是传教士的文化活动，它们在清廷所引起的政治恐慌更是一个政治事件。清廷以及沿海各地方当局对刊发传教书籍的追查促使教会以书籍传教方式的暂停，这与传教士三次航行散书的初衷相悖。他们所散之书，在语体和内容上都不能被传统知识界所接受。三次散书事件表现出西方教会宗教宣传迫切的主动性，而各级官员文人则对之多是驳斥和查禁的态度。这是弛禁前西教知识在中国传播初期两种态度的错位。

第二章主要探讨了西教知识在传教士文化活动和新兴地学者之间传播的关系。西教知识在中国传统知识界中的传播首先要通过主流知识分子对之的文化筛选，以使之纳入新兴地知识结构中，这样，西教知识才能借此在知识界得到广泛传播。道光、咸丰年间经学风气的转变是晚清局变中中国近代化指向的一个标志。在经世致用目的指引下，中国知识界掀起对边疆和世界史地研究的思潮。由于研究西教知识多来源于舆地思潮中的著述，具有近代指向。在新舆地研究中产生了大量的著述，这些著述承载丰富的西教知识，它们直接来源于传教士沿海所宣传的宗教册子、明清时期的传统典籍以及著者与教士接触等几个主要途径。这些著述成为晚清知识界中西教知识传播的源头之一，它们在几代知识界中的影响也使其中含载的西教内容得到广泛的传播，并为此后反洋教思潮提供了了解西教的文本。

第三章主要考察了19世纪60年代逐步兴起的“走向世界潮流”对西教知识摄取并传播的历史现象。出洋的民间和官方文人身历西方基督教国家，直接感受其宗教生活和文化，在日记、游记中大量记载。这些文人在出洋前的知识准备中，多将新兴地思潮中的经典著作随身携带，以便了解西方情状，这是其了解西方基督教的知识储备。他们在西方基督教国家对西教的认识和理性判断不仅检验了其西教知识的准确度，更通过亲身的见闻而补充丰富之。他们在日记中大量记载了西教知识。应清廷日记呈交制度的规定，他们的日记被呈送清廷，也被民间和官方刊发传播。随着这些文本的流传，其中的西教知识在士流中也得到传播。他们甚至也影响了国内各级洋务官员、文人对教案、教务交涉中盲目排外的态度，使之西教知识在中国士流中传播的一个重要环节。第四章，论文讨论了晚清反洋教思潮中西教知识的传播情况，主要选择了反洋教运动中的文化反教部分，以文书揭帖中西教知识的传播为研究对象，对这些文书揭帖中也大量存在被误解、歪曲的西教知识。对他们的文本流传和西教知识摄取途径的研究是解释其反教原因的关键。在文化因对上，传教士的文化宣教活动与中国文人的文化反教活动是相对存在的。针对教士的散书传教，地方士流以匿名文书揭帖作为反教的方式；针对教士宣教，各类文人主张以宣讲《圣谕广训》作为限制和反对西教传播的文化对策。揭帖中西教知识多来源于舆地思潮中的著述，走向世界潮流中的著述。它也是近代西教知识在中国知识界长期积累和传播的结果。它对晚明、清前中期以及晚清反教资源的挖掘，体现了中国传统知识界中西教知识的内发性传播方式。

最后，本文尝试从时序中观察中国知识界对西教知识内发性传播的流变，并归纳出其表现出的特性。同时也分析了在晚清传统中国内发性文化、宗教结构逐渐解体的文化环境中，西教知识的传播情况。最后选择了一条延续在晚明降至晚清的“西教东源”说作为个案，来分析西教知识在文人所表现出的内发性传播特性。

9. 期刊论文 陈重耕 基督教在中国近代传教权的攫取 -文山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3, 16 (1)

鸦片战争以后，基督教三大教派尤其是新教和天主教依附列强通过不平等条约获得在华传教的合法权利。西方教会利用政治手段来达到传教目的的事实和传教士在华的种种劣迹行为，引起中国人民的极大反感，成为近代教案频繁发生和义和团运动的基本原因之一。

10. 期刊论文 李英玉 欧亚空间视域下的俄罗斯文化特征 -学术交流2010, "" (4)

俄罗斯横跨欧亚大陆，俄罗斯文化在如此大的空间里发展，一方面继承了东斯拉夫和其他部落的文化传统，同时在与各民族不断整合与斗争中融合了异族的文化成分，另一方面吸收了以拜占庭文化为主的东西方文化成分，形成了别具一格的文化。俄罗斯文化本质上是一种宗教文化，因为俄罗斯民族复兴特征是皈依东正教。俄罗斯东正教源于拜占庭，它是东方教会的希腊教派，而不是西方教会的天主教。俄罗斯文化滞后于西方文化数百年，没有经历文艺复兴时代、蒙古鞑靼征服和统治为俄罗斯铸就了专制制度的模块。金帐汗的绝对权威和无限权力向俄罗斯的王公们展示了专制权力的概念。专制制度不只是俄国的政治制度，而且也是俄罗斯民族文化的特征。东正教与专制制度构成了俄罗斯文化的独特内涵，并反映了俄罗斯民族独有的精神生活和政治统治方式。

引证文献(1条)

1. 薛熙明, 魏雷. 广东基督教文化与岭南文化之整合研究[期刊论文]-热带地理 2008(1)

本文链接: http://d.g.wanfangdata.com.cn/Periodical_jydxxb200301023.aspx

授权使用: 广东商学院图书馆(gdsxy), 授权号: 409725d0-751d-431d-aafb-9e4d007465e1

下载时间: 2010年12月15日